

碰撞与 创新

中西哲学特色比较研究

I nteraction and Innovation: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Philosophy

李 元 ·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碰撞与创新

中西哲学特色比较研究

I

nteraction and Innovation: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Philosophy

李元·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碰撞与创新/李元著.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
ISBN 978-7-5520-0354-3

I. ①碰… II. ①李… III. ①比较哲学-研究-中国、西方国家 IV. ①B1-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65900 号

碰撞与创新

——中西哲学特色比较研究

著 者:李 元

责任编辑:杨 国

封面设计:闵 敏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org.cn> E-mail:sassp@sass.org.cn

照 排: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 刷:上海信老印刷厂

开 本:787×1092 毫米 1/16 开

印 张:12.25

插 页:2

字 数:200 千字

版 次: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0-0354-3/B·088

定价:2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导论	1
一、写作缘起	1
二、研究现状	7
三、本书思路及文献学基础	10
四、主要研究方法	12
 第一章 时代变迁与哲学的使命	20
第一节 社会生活的挑战	20
第二节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	25
第三节 中国哲学的宗旨	36
 第二章 西方哲学的本体论特征	45
第一节 “普世”概念与西方哲学传统	45
第二节 西方反对普遍知识的倾向	53
第三节 非普遍知识对人生的价值	59
第四节 普世价值与普遍主义	62
 第三章 中国哲学形态的基本特征	67
第一节 中西哲学比较的方法论研究	67
第二节 中西哲学比较的几个重要问题辨析	71
第三节 中国哲学形态的特点	82

第四章 哲学主题的生存状态转换 96

 第一节 西方形而上学对经验的超越 97

 第二节 关注生命是中国哲学原则的主线 109

 第三节 生存状态分析的主题化 116

第五章 会通以求全胜 129

 第一节 中国哲学的世界传播 129

 第二节 现代西方哲学的困境 141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 146

附录一 普遍主义思维方式的局限与价值僭越 162

附录二 冷战后俄罗斯价值生存方式的新趋势 173

中西文参考文献 183

后记 191

导 论

一、写 作 缘 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关注中西哲学比较研究。时至今日,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已发展成为国内哲学界最具活力的特色学科之一。近 10 年来,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其他地方,哲学工作者都越来越清晰地发现,未来哲学和文化的创新将最有可能在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中开花结果。它不是一种哲学压倒另一种哲学,或一种文明与另一种文明对抗性的冲突,而应该是基于不同哲学视角、方法、语言表达方式及其思维方式的碰撞与创新,而中国哲学将在未来这个特殊的时代对西方哲学大有裨益。

2012 年 3 月,笔者应邀访学美国,在纽约参加纽约大学和全球出版社主办的“第四届知识全球化论坛”。在中美哲学的学术交往过程中,发现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西方哲学使用逻辑规定性的概念(范畴)表达现实世界中的事物的传统,如今还在深刻地影响着现代哲学工作者。哈贝马斯写就《后形而上学的思想》(2003 年)批判本体论,代表了现代哲学积极的声音,但最终也表现出“后形而上学的迷茫”。从美国哲学家安乐哲(Roger Ames)教授对本体论特征的论述中,笔者发现:基于本体论的超越性反思可能就是西方现代哲学无法走出这种迷茫的内在原因。概念(范畴)表达的是用逻辑思辨方式构建的语言结构和思维系统,这种思维方式中的人处于脱离具体生存状态及世界联系的“纯粹意识”之中。也就是说,这个本体论的超验性状态与欣赏音乐、绘画等审美体验不同,它是与普遍必然性的形式逻

辑展开的概念、判断和推理的生存状态。这就是黑格尔所谓的“红”的概念比任何日常生活中具体的“红色”都更符合“红”的规定性。从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中国哲学没有西方哲学 Ontology(是论)意义上的本体论思维。并且,现代哲学的发展趋势正是在反对本体论中不断行进的。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哲学研究的重要手段由数理逻辑逐渐被物理学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所替代,使科学概念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作为时代精华的哲学,随即出现了唯意志主义、实证主义、新康德主义、直觉主义、分析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实用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新流派,赋予西方哲学更多的东方色彩,带来西方哲学 2 000 年来最为深刻的思维方式变革,出现了反本体论形而上学、反逻各斯中心主义、反主体主义、语言转向对情境的关注等新的研究方法。其中,解构主义的“相对主义真理”,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的“语言游戏说”,詹姆士、杜威等实用主义,戴维森、普特南等新实用主义转型,相比于传统西方哲学,拉近了与中国哲学的距离,有了更深入的哲学对话。

诚然,西方本体论思维方式与中国哲学悬殊很大,让大多数没有受过西方哲学“思维训练”的中国读者看起来不是那么容易理解和进入。因为在中国哲学中,我们难以体会脱离生活而走向超验性(Transcendence)的形而上学,并且还能够以第一哲学的原理,不证自明地介入世俗生活。那么,两千多年的西方哲学究竟是如何“看”世界的、哲学的观念本身是否应该固定不变?如果中国人从来不曾这样地“看”世界,那么中国人又是以什么方式与世界发生联系呢?上述这些都是哲学问题,是关乎哲学未来发展方向以及人文基础学科未来发展的深层理论问题;也潜在蕴含着未来 10 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实践发展方向,因此就成为我们在新一轮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中亟待解决的思想理论课题。

在中国最早的哲学经典著作《周易》一书中,提出了“道”处于生生不息的变化过程之中的重要思想,把对宇宙自然的形而上超越性扩展到不同生存命运中的人自身和社会的选择中去,在变化的生存状态中实现“知人”与“知天”的统一,即形而上超越性的生命自觉,最终回归哲学的源头。“凡人

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管子·内业》)在这种哲学观的影响下,中国哲学的类比逻辑及其实现方式蕴含在“天人合一”的感应之中。中国人的日常养生,就是一种与具体生存方式合一的哲学实践。“将养其神,和弱其气,平夷其形,而与道沉浮俯仰”(《淮南子·原道训》),说的是一种哲学养生的境界。这种世界观体现在人自己身上,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它与“道”是相通的,这就是中国哲学所谓的“知行合一”。因此,中国哲学的宗旨与日常生活语言之间从源头上说,没有截然对立的思维界限。“此情只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李商隐《锦瑟》),说的便是不可言说在语言与沉默之间哲学的妙境,即能够通达。即便禅宗的不立文字增加了不可言说之禅意,但其主张在生活中体验形而上的哲学超越性意义却也是深入浅出的。

由此可见,中国哲学的日常语言注重事情本身的明白通透,无论表达方式如何,都在于表达情感、交流思想、获得共识。对于语词使用的概念虽有名实之辩,却不作逻辑范畴的思辨切分,呈现一种放松的、混沌的、审美式语言结构。它不仅体现在哲学的悟性思维方面,“担水劈柴无非妙道”与中国古琴、书法、绘画、武术功夫等皆可“得道”。这就是中国哲学所说的“道可道,非常道”(《道德经》)。

“使某人明白某事”,在西方哲学中可不是件简单的日常话语体系,它被称为“释义学”(Hermeneúein)。近代释义学的参与者有两个:神与人。起源于希腊宗教、犹太神学和基督教神学的释义学,包含着“表达”、“解释”和“转译”。释义活动,就是表达、解释和转译,即神的世界如何来到了人间。代表上帝权威意志的人,通过神启,向人传达神的意志。如此一来,人外在地为自己树立了上帝,用以沟通人事与世事。因此在释义学的基础之处,人与神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固有张力。即便有人提出释义学与中国哲学中“知音”的审美体验有相似之处,但西方神学释义学传统熏陶出来的西方历史,是奠基在人与神这两种不同领域的观念之上,体现在超越性上内在蕴含着主体与客体的分裂危险。西方哲学将世界划分为认知主体“我”和认知客体“对象”,我对客体的审美总是来自对象外部的,我是以局外人的身份展开的

审美,客体作为认知对象,是被动的、疏离的,最后甚至是断裂的。这种释义即使扩展到主体与主体之间,即主体间性,仍然难脱主体符号化的危险。

中国《列子》一书中讲述了钟子期的故事:“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志在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则志在流水。”从此成就了高山流水谢知音的佳话。知音不仅有“披文入情,沿波讨源”的认知能力,而且有观高山圆照之能量,还要有视流水妙喜之觉悟的能力。这里的“觉”和“悟”都蕴含着人根据自身独特生存命运。“稚子问翁新悟处,欲言直恐泄天机。”(陆游《醉中草书因戏作此诗》)这是顺应“天机”调整自己回到形而上源头的开放性,是独到的个人生命体验。这种态度无论对个人还是对社会,都是永葆“赤子之心”的秘密,也就是做人的“道”所在。因此,西方哲学需要不断提醒自我去超越尘世的彼岸世界寻找与“我”分裂的对象相互交融的原始奇点,而中国哲学在原始生发处便是合一的。因此中西哲学是两种不同的生活态度。

现代哲学发生语言转向之后,分析哲学的语言分析主要针对科学语言进行逻辑分析,或者对日常语言进行语义分析,为西方哲学增添了新意。但由于哲学家偏重于语法学或句法学的研究,即纯粹从逻辑方面研究符号之间的纯逻辑形式关系,而不涉及语言的内容。因此,当生存状态的主题发生转向时,西方哲学必须首先完成将哲学从概念范畴的观念体系所指中解放出来的首要任务,进而才会有将人从单一的生存状态中释放出来的全面发展。

西方哲学的逻辑思辨性最具代表性的提问方式为:什么是什么?例如,什么是善?什么是知识?什么是哲学?要回答西方哲学提出的这种类型的问题,日常语言形式是有局限的。西方哲学的逻辑思辨式语言必须经过思维专门训练的“学院派”掌握的知识(真理),通过具有本原、始基、原理、原则等“本体论”意义上的普遍必然性法则建立范畴之间的关系,运用逻辑思辨形式进行概念之间的判断、推理,才能得到所谓客观的真理。也就是说,获得知识(真理)的道路是逻辑概念的超验思辨形式铺就的,舍此难以到达西方哲学的所追求的形而上学的普遍性,而这种模式被西方哲学尊为哲学的

传统。但如果“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道德经》第五章），那么还怎样理解上帝的至善呢？因此，康德的意义就在于他提出了上帝是信仰的对象，而不是认知的对象，从而那位曾经在认识领域被驱逐出去的上帝，在实践领域又被请了回来。归根结底，这病根还是出在本体论为特征的西方哲学观念上。

鲁迅先生曾将刘勰的《文心雕龙》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相提并论。由此可见刘勰的《知音》篇中讲述的审美哲学蕴含着非常丰富的哲学道理。但他提到，“麟凤与麀雉悬绝，珠玉与砾石超殊，白日垂其照，青睞写其形。然鲁臣以麟为麀，楚人以雉为凤，魏民以夜光为怪石，宋客以燕砾为宝珠”（《知音》第四十八）。出现这种情况，读者也许会觉得不可思议，怎么可能将野鸡视为凤凰，把乱石视作珍珠呢？然而，人生中的选择不就是如此吗？运用绝对概念的思辨逻辑分析和解构的，关于人生境域的选择问题，最终只能走向荒谬，因为试图脱离经验世界走向超验的企图，惯性存在于因果关系替代一切非逻辑性关联的逻辑思辨之中。过度理性一旦超出了自身的限度，最终便只有走向理性的反面。而这种力图维护范畴的逻辑推论的抽象真理就是 Ontology，它是学院式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它将哲学与人和人的生活世界隔离开，发生断裂、终止或中止，只有生存却失去了生活，西方现代哲学的危机和现代生活方式的危机就根源于此。

近 10 年来，在中西哲学的新一轮比较研究中，西方哲学学者自己也逐渐意识到这种思维方式的危害，越来越多的当代西方哲学家否认西方“哲学”概念的有效性。在事物依它们一定的关系而形成的这个世界里，意义总是随着生存状态的环境而变化，并非是以外在于人的根据（上帝的概念、自然法则或柏拉图的理念世界）从所指中产生，而是从“是者”本身，即人本身生发创新。观念所指，提供的是看待世界的逻辑结构，这种结构体现在哲学中是用概念（范畴）表达的。哲学概念（范畴）具有普遍性和完美结构，因此总是指向所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谓客观的、普遍必然性的知识（真理）。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后现代危机的错综复杂，人类的生存理解对同一个人也呈现出多种可能性。怎么做到用单一的因果论来解释纷繁复杂

的生存体验呢？哲学必须成为普遍必然性的宇宙论吗？如果不是，那么它应该是什么？哲学的目的最终是为了人类更好地生存下去。在这一点上，希腊哲学的伊壁鸠鲁以及米歇尔·德·蒙田、卢梭、尼采、海德格尔、梅洛·庞蒂、约翰·杜威、爱默生等与中国哲学都特别亲近。尽管这种思维方式没有成为西方哲学的主流，因此不能从根基上对其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但是它代表了中西会通的一种可能，正所谓“天地一指，道通为一”。

当然，如果继续将以本体论为特征的西方哲学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发展下去，现代自然科学无疑是最大的受益者。但继全球金融危机、生态危机和“全球化陷阱”、生命伦理危机之后，未来科技的伦理目标正在经历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和普遍主义的严峻考验。人类能否在思维定势中不断适应不同生存状态转换的要求，将决定人类自身在未来人文与科学的世界中生存下去的可能。

这是一个哲学观念更新的时代。更新并不意味着死亡，而是破茧而出。一位西方哲学家曾说过“哲学终结了”。不是说时代不需要哲学了，这个矛头直指西方哲学，认为传统意义上的西方哲学走到了生死存亡之际。这种哲学态度在全球化背景下，一方面伴随着东亚价值观与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中、在中国和平崛起和发展中国家新型经济体的走强中，西方哲学界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开始深入反思；另一方面基于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危机和马克思主义复兴趋势的痛定思痛。西方哲学寄希望于能够在其哲学体系内部转换角度，对西方哲学的局限发展创新。因此，西方不得不将自己的视野转向东方。

中国哲学要向世界提供未来社会的生存智慧；中华民族及其优秀文化要在全球化的多元背景下同舟共济地生存下去，必须将哲学研究与人类的生存状态结合起来，也就是说要让哲学与人结合起来。在这一主题下，多元文化下的和谐方才得以可能。正是基于这样的使命感，尽管本书中的许多观点还不够成熟，需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但笔者还是决定将其出版，目的就在于抛砖引玉，并吐露一个中国青年学者的心声——对中国哲学的忧患意识和历史责任感。

二、研究现状

2003 年中国媒体曾将学术界关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评选为当年的十大学术热点之一。10 年来,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呈现越发活跃之势。国内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在一个问题上达成基本共识:西方哲学是以本体论为特征的形而上学,而中国哲学不存在这种意义上的本体论,并且现代哲学最为迫切的就是在本体论批判中重建哲学观念,转入对人生存状态分析的新视角。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国内进行的中国哲学学科建设及其方法论研究,都是基于西方哲学的传统。西方话说多了中国话说起来难免也变了味儿。尽管我们尊重历史,但是如何在时代变迁的历史洪流中,发挥中国哲学对人类的历史责任与价值,这既是国内从事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责任,也包括每个中国人在内的新的客观现实。

2005 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前辈俞宣孟与何锡蓉研究员主编的《探根寻源——新一轮中西哲学比较研究论集》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入了一系列高质量的论文,比较有代表性的分别是:《认定本体论是西方传统哲学形态的主要特征及其意义》(王森洋)、《关于 ONTOLOGY 引出的哲学新界定——兼论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新问题》(俞宣孟)、《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新进展——兼析所谓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何锡蓉)、《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新进展——兼析所谓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形而上学与哲学的内在视阈》(杨国荣)、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的《从怀特海谈起——在阅读中重建孔子》(Roger Ames)、《西方哲学传统中需引起中国哲学家关注的那条支流》(Graham Parkes)、德国伯恩大学教授的《中国有“释义学”吗?》(Wolfgang Kubin)、加拿大 Brock 大学教授的《道家与当代哲学》(Hans Georg)等。

2011 年彭永捷先生主编的《论中国哲学学科合法性危机》由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选辑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哲学形而上学与西方哲学比较的

最新研究成果,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论文有:《中国哲学的“自己讲”、“讲自己”——论走出中国哲学的危机和超越合法性问题》(张立文)、《论中国哲学学科存在的合法行为及——关于中国哲学学科的知识社会学考察》(彭永捷)、《从“哲学在中国”到“哲学节在中国”》(彭永捷)、《汉语哲学如何可能?》(彭永捷)等。

法国当代哲学家、汉学家,现任巴黎第七大学教授,葛兰言研究中心主任及国际哲学学院院长弗朗西斯·于连(Francis Yulian),通过中西文化比较重新思考中国及西方文化传统发表了《鲁迅,写作与革命》、《隐喻的价值——中国传统中的诗解释的原始范畴》、《过程和创造——中国文人思想导论》、《平淡颂——从中国思想和美学出发》、《物势——中国有效性的历史》、《内在之象——〈易经〉的哲学阅读》、《中庸》、《迂回与进入——中国和希腊意义策略》、《道德奠基——孟子与启蒙哲学家的对话》、《效率论》、《圣人无意——或哲学的他者》、《裸体或真理的本质》、《论时间——一种生活哲学的要素》、《大象无形》等专著,与马尔谢斯合作的《从外部思考》等。中译本有:《圣人无意——或哲学的他者》、《迂回与进入——中国和希腊意义策略》、《道德奠基——孟子与启蒙哲学家的对话》等著作。弗朗西斯·于连可谓国外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大家。

在对近10年国内外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现状梳理之后,笔者针对当代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三个关键问题,概括出以下三个方面的结论,希望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

(一) 确定当代中西哲学比较研究方向的前沿问题

国内中西哲学比较研究要走在世界前沿,需要我们首先回答究竟什么是当前哲学前沿性的课题。国内学者认为,关于对 Ontology 学问的研究和对本体论为特征的西方哲学传统的批判应该成为研究中西哲学比较的前沿问题(俞宣孟、王森洋)。但这其中也有分歧。国内学者提出是否有必要建设中国哲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何锡蓉),如果中国哲学有形而上学,那么这种形而上学是否与西方哲学的底本相结合为好(杨国荣);而国外学者则认为,西方哲学传统的特征应该是指超验性(Roger Ames),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

的文本虽有相似之处,甚至有不可思议的巧合之处;但是否可以将以神秘主义和直觉体悟著称的中国思想列入哲学范畴之内仍然是个悬而未解的问题。

(二) 辨明当代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主题

国内目前比较前沿的共识认为,自西方现代哲学家马克思和海德格尔提出生存方式的转变和哲学观念的更新之后,西方哲学中出现了向东方靠近的意图。而中国哲学宗旨以人的生存状态分析为主题是一贯的主线,对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借鉴性。但也有学者指出,西方哲学对中国思想的吸收只是手段,语言、文本等情境因素的介入,并不影响西方哲学的本体论特征。而中国哲学的本体论重建问题,仍旧是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重点。而这一问题进而又关系到佛学和马克思主义是否具有本体论的问题,以什么作为本体论的问题,以及具有当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问题,甚至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的讨论等。但是近来学界研究表明:佛学与中国哲学的融合,最终没有出现西方哲学意义上的本体论。

(三) 当代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中的哲学观念变革

当代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新一轮发展,更深入地触及到关于“哲学”概念本身的多元文化理解背景问题。如果中西哲学要回应时代和人生的挑战,超出作为范畴、观念、概念、真理、知识等内涵的哲学理解就势在必行。也就是说,“哲学”一词,不能再局限于向上求索去追问抽象、绝对、超验的知识(真理),而是要转头向下,深入生活的泥土,正所谓树高千尺也离不开它的根。如此一来,就继续了马克思与海德格尔从两个不同角度进行的哲学观念更新的思路。这条路西方现代哲学曾经是绕着走的,但最终还是不得不又回到了这条路上来。而哲学观念的更新,说到底是对人自己的重新认识。

当哲学在理论上经受了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到普遍主义的洗礼后,实践中的人们则面临更为严峻的生存挑战和价值选择问题:金融危机、环境生态危机、信任危机、文化危机……一向被认为科学客观的理性,在普遍主义的

思维方式下,即把相对经验的普遍性上升为绝对经验的普遍性,也就是脱离了经验走向超验的普遍真理。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就是很好的例子,“经济人”的理性假设,最终却使理性人走向了理性的反面;生活的逻辑思辨化还未促成客观有效的世界哲学,却成为全球化陷阱、文化霸权和“普世价值”的代名词。生活没有既定答案,需要我们人类携手探索,在这条路上“丛林法则”失效。如果人们还一味地复制生活,那么哲学便无法回到原初的源头,哲学与人之间的分裂超过了理性的限度就在所难免,而像上帝一样掌握话语的绝对权威和原则的绝对客观性,维护人生尊严的初衷就会大打折扣。

三、本书思路及文献学基础

导论对研究牵涉的哲学的基本背景知识加以概括介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本书所要研究的理论问题、运用的基本研究方法,介绍本书希望达到的研究目标及其实践意义。

第一章介绍21世纪的人类各种生存状态不断呈现更为复杂的矛盾和冲突。人类看待宇宙自然、历史社会和人类自身的方式随着科学技术的深入发展而不断变化和融合。几十年来西方自由主义经济伴在经历了美国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之后,严重受挫。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各种迹象表明,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经济复苏困难重重。而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等经济增长为全球经济的复苏提供了强大支持。西方哲学对其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开始更加成熟的自我反省。而全球化作为东西方共同的生存背景,东方,抑或是西方,如何化解危机、携手合作、同舟共济,要求在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中,找到共同的研究主题,开展中西哲学合作。

第二章重点探讨本体论是西方哲学的主要逻辑特征和精华所在。从哲学形态研究,西方哲学之所以能以追求普遍原理或普遍知识为宗旨、形成逻辑思考的特征,与其所使用普遍概念的思维传统密切相关。西方哲学的大厦是用各种普遍概念建造的,普遍概念是构成西方哲学大厦的砖块,思辨逻辑是它的运思方式,超验形而上学的本体论知识是西方哲学的宗旨和目标。

尽管这种本体论以脱离经验的超验形而上学为哲学的本质,但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对经验的生活世界产生的影响却是西方哲学内部始料未及的。本体论传统最终导致哲学与人和生活世界分离造成的现代哲学危机。因此,所谓的后现代以来的西方现代哲学基本上都是在批判本体论的呼声中形成的。

第三章详细分析历史。从西汉开始时至今日,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流,包括哲学观念和思维方式之间不断碰撞与创新,我们经历了依傍西学、构建西方哲学本体论为特征的中国哲学学科建设阶段,经历了“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经历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逐渐走向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与西方哲学以绝对的普遍概念为基础构成的,以普遍知识(真理)为形态特征的哲学学科,如何与以“知行合一”为宗旨的中国哲学特征知己知彼?两种哲学形态差异万千,但最终是否可以殊途同归?

第四章主要阐述如果哲学的开端在于面向未来变化的人生问题,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理解哲学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它与生命人生脱离的纯粹理性之思,还是与人生活状态息息相关的一种思维范式。西方,抑或是东方,人类面对越来越复杂多变的生存环境,生活压力、价值观冲突、理想信念丧失……我们在理想与现实中,究竟要如何生存下去?这是生活赋予哲学的疑问,也是哲学本身的时代之思。因此就成为哲学更新中的新的研究主题。

第五章的主要内容为忧患意识与 21 世纪对人类共同前途命运的主题无可逃避地成为中西哲学荟萃的一个焦点,人类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生存现状所遭遇的困境,越来越成为中西哲学共同面对的生活背景,因此将哲学理解为自身与世界的生命关系,就有了更多的契合之处。这种在哲学根源处生发的,以生活态度和生命自觉为主题的哲学碰撞与创新尽管不可避免。但是,理论的可能性最终如何化为现实性,需要中西哲学共同应对 21 世纪的生存挑战。这是前所未有的挑战,没有既定原理、原则不证自明的作为参考,甚至也没有既定答案。而中国哲学的职责就在于把一种不同于西方哲学的中国哲学路径指示给世界看。“月映万川”,但重点不在手指,还在于明

月。以史为鉴，会通以求全胜。

四、主要研究方法

从事西方哲学专业的研究人员，如果能够在中国哲学领域多下些功夫，那自然是再好不过的。在这些年研究的不断深化中发现，以中西哲学存在的事实为依据，对其产生方式的根源进行研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非常重要的研究方法。唯物史观对哲学产生源头的论述相当精深：“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态，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做当然就能够完整地描述全部过程（因而也就能够描述这个过程的各个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了。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①沿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思路，我们追溯中西哲学产生的过程，希望勾勒出新一轮中西哲学比较的方法论，进行生存状态的分析。

对近 10 年来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现状的分析，笔者发现中国哲学语言表达的本体论形而上学痕迹不是语言哲学问题，而是研究方法和哲学发展方向上的总体倾向。本书致力于将义理与文献学相结合，研究目的无疑是双重的：一方面是体悟式的；一方面是思辨性的。研究方法的重点放在对中西哲学关于哲学义理性层面上的论述和分析，从而在哲学层面上展开这一主题的更为深刻的论证工作。这倒不是比较逻辑思辨与直观体验的研究方法哪一个更深刻，而是从整体研究方法上对研究工作进行补充。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42—44 页。